

OXFORD

Survey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華人社會的調查研究

邊燕杰 涂肇慶 蘇耀昌 編

方法與發現

25

SURVEY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METHODS AND FINDINGS

華人社會的調查研究

方法與發現

編者

邊燕杰、涂肇慶、蘇耀昌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á Buenos Aires Cape Town
Chennai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olkata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Mumbai Nairobi
Paris São Paulo Shanghai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Warsaw

with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First published 2001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華人社會的調查研究
方法與發現

編者：邊燕杰、涂肇慶、蘇耀昌
Survey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Methods and Findings

Edited by

Yanjie Bian, Edward Jow-Ching Tu, Alvin So

ISBN 0-19-593011-8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序

金耀基

社會學是一門多元典範的學科，這是社會學者的一項共識。社會學研究對象是社會、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是自然。從來，社會學家就面對這樣的問題：社會與自然的本質與其構成邏輯有何異同？如何去掌握社會的本質及用什麼途徑去研究社會？由於對社會本質有不同的認識，而社會學的先驅或奠基人，如杜爾凱姆(Emile Durkheim)、韋伯(Max Weber)、馬克思(Karl Marx)，又各有不同的「問題意識」，從而社會學思維一開始就出現多元的面貌，並發展為不同的傳統。在古典社會學傳統學派中，杜爾凱姆的實證主義學派顯然是居正統地位的，他開展的「社會事實」典範也始終是學院中的主流。更值得指出者，自二十世紀初葉以來，相應於「社會事實」典範產生的 *hypothetic-statistical method* 始終是社會學任何一個專業領域中的「方法論的典範」，而這個方法論的典範事實上亦被視為甚或等同為社會學的調查研究方法。儘管半個世紀以來正統的實證主義的社會學典範已受到深刻的挑戰與批判，但 *hypothetic-statistical method* 在方法上的典範地位依然未變，或者說，它仍然是絕大多數社會學專業者從事研究時奉為圭臬的。美國的社會學的學術成果，主要

* 金耀基為著名社會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座教授、副校長。主要著作包括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社會與文化》、《中國政治與文化》、《大學之理念》、*Chinese Society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就是通過分析問卷調查結果為基礎的，而問卷調查即是這個方法論典範主要的實踐形式。

本書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新成立的「調查研究中心」所出版的第一個論文集。「調查研究中心」主任邊燕杰教授是近年在中國研究上成績出色的一位社會學者，在調查研究方法上，尤有深厚素養。這個他與涂肇慶、蘇耀昌二位教授合編的論文集收有十三篇論文，論文作者都是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在社會學研究方法學上有代表性的學者。這個論文集的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三個華人社會的近期調查研究的成果的分析，一是討論調查研究方法的各種問題。從這些論文中，我們可以看到調查研究方法在三地社會學界分別發展的歷史與經驗，以及在實際應用中所取得的具體成果與學術意義。無疑的，這個論文集特別會引起讀者知性趣味的是它對調查研究方法的各種有關問題的檢討與反思。

論集的作者對調查研究方法的檢討與反思是多層次的。首先，作為一種在西方發展出來的社會學的研究方法，能否原封不動地用來研究華人社會？再者，兩岸三地的華人社會，鑒於在發展位階，意識文化及制度構築上的不同，適用於研究香港或台灣的方法又是否一樣可以研究中國大陸？在這些問題上，論集中的論文有很深入的分析與討論，它們對於調查研究方法所遇到的共同性問題與特殊性問題的論析，從理論層面到技術層面，從概念的逐譯到文化心理的異同的認定都有細緻的論述。本書第一章的「導言」對於整個論集展開的議題提供了一個很有用的論述架構。而作為論集結尾篇的邊燕杰教授的〈關於問卷調查方法的思考〉的論文，則着力於彰顯論集中作者提出的問卷調查方法的一些甚具批判性、挑戰性的思考，這無疑對從事華人社會研究者有很好的啟示作用。不寧惟是，他還從四方面深入地

討論問卷調查對理論建構的意義。誠然，社會學的經驗研究與社會學的理论發展二者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邊教授的精緻的論述可以說是牟頓 (R. Merton) 半個世紀前發表的〈社會學理論對經驗研究的作用〉及〈經驗研究對社會的理論的作用〉二篇經典性的論文的一個新的引伸。這個高水準的論文集是探討社會學調查研究方法極為少見的中文著作，無疑的，它是「華人社會調查研究」不容忽視的一本書。拜賞之餘，略綴數語，是為序。

目 錄

序	金耀基	vii
第一章		
導 言	蘇耀昌 邊燕杰 涂肇慶	1
第二章		
香港社會調查的回顧	李沛良 梁懿剛	13
第三章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進展與問題	瞿海源	43
第四章		
實證社會學調查的理論前提		
——對大陸社會學調查理論前提的反思	劉少杰	63
第五章		
「心理二重區域」與中國大陸的問卷調查	李 強	81
第六章		
社會調查質素		
——無回應問題的思考	陳膺強	91
第七章		
台灣民眾環境意識的轉變 1986-1999	蕭新煌	103
第八章		
市場轉型與中間階層的代際更替	李 強	141

第九章

中國男女的性別態度及其對就業投入感的關係 譚若梅 165

第十章

性別、個人網絡與社會資本 熊瑞梅 179

第十一章

中國農村工業化

——調查研究的發現與理論解釋 劉創楚 彭玉生 217

第十二章

收入不平等又如何？

——中國農村的非農就業及其分配性後果 龔啟聖 李耀輝 237

第十三章

「過程－事件分析」與對當代中國農村

社會生活的洞察 孫立平 273

第十四章

關於問卷調查方法的思考 邊燕杰 297

導言

蘇耀昌 邊燕杰 涂肇慶

最近二十年，台灣、香港、中國大陸都相繼出現了社會科學調查「熱潮」。學者、政府和私人機關都對調查十分重視，大力推行各項的大型社會調查。

八十年代之前，雖然台灣社會已經具有高速的經濟發展，但它缺乏可資分析的調查資料。以往學者雖也從事有關的調查，但規模不大，更沒有全台灣的抽樣調查資料。有鑑於此，台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和社會科學研究所，及台灣大學在一九八四和一九八五年進行了一個大型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到一九九九年這項基本調查總共進行了二十個全台灣抽樣調查。原則上，每個調查以五年的間距重複調查。調查主題包括下列的項目：居住環境、人際關係、生活品質、傳播態度、經濟態度、社會問題、成就期望、政治態度、宗教行為、休閒活動、教育價值、家庭特徵、教養方式、個人現代性、疏離感、心理健康、醫療行為等。

香港的大型調查，是在六十年代後期開始流行。由於急劇的社會變化，政府與學術團體需要有系統地搜集大量而詳細的資料，以了解香港人的生活態度和他們對社會的意見及需求。早期的調查包括香

* 蘇耀昌為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學部教授、社會科學學部主任、「調查研究中心」執行委員。

邊燕杰為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學部副教授、「調查研究中心」主任。

涂肇慶為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學部副教授、「調查研究中心」執行委員。

2 華人社會的調查研究

港中文大學的社會學者和相關學科的學者，透過「社會研究中心」對觀塘新市鎮進行一系列研究，探討一個華人密集的工業化社區，如何成長及發揮各項社會功能。觀塘社區計劃規模龐大，包含了不同的項目，如政治文化、健康態度、家庭分工與權力結構、生育計劃、小型工廠等。在九十年代，因有香港政府「研究資助局」的支持，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和香港大學進行了一個大規模的「社會指標研究」。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七年間，這個社會指標研究共舉行五次調查，探討人們對各個生活領域的滿意程度。除了共同問題，每次調查都包括一些比較深入的課題，如社會網絡、福利需求、社會流動、性別關係等等。

在中國大陸，社會學界對調查亦給予了高度重視。八十年代初期，已開展了很多規模不一的調查，而且發表了許多針對各種社會問題的調查報告。較早的大型調查包括全國五城市婚姻家庭調查，北京職業聲望和地位調查，天津市千戶問卷調查等。在大陸最高層次的社會學刊物《社會學研究》中，便可看到很多依據調查資料撰寫的研究報告。由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八年，共有一百三十一份的調查報告在《社會學研究》上發表。除了學術機構，很多政府單位和私人團體亦時常用調查方法搜集資料，大陸市民亦開始有受訪的經驗。

雖然調查研究在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已經成為一股「熱潮」，但是仍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首先，調查是西方社會的產物，現在用它來研究華人社會，是否適合呢？在大陸、台灣和香港推行調查研究，會碰到哪種困難呢？因大陸、台灣和香港是不同性質的華人社會，我們怎樣比較他們的研究成果呢？

在這導言內，我們將首先探討調查研究方法，然後討論調查研究成果。

華人社會的調查研究方法

我們可以用三種不同的角度去探討華人社會調查研究方法：(一)共同問題。無論是在西方社會或是華人社會，都會碰到共同的調查問題。(二)華人社會的問題。因為華人社會有別於西方社會，所以華人社會的調查問題和西方的問題會有所不同。(三)大陸社會的問題。在華人社會中，台灣社會和香港社會較接近，而他們和大陸社會差距頗大。因為不同的歷史因素、經濟結構和政治環境，大陸社會有它的獨特調查研究問題。

(一)共同問題

(a)抽樣問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社會變遷加速，人口流動增加，住址時常改變，社區在短期內變化亦很大，因此，面臨抽樣問題。在台灣和大陸，抽樣問題大致上就是戶籍和實際居住地的差異。這種差異會降低調查完成率，也會使得在統計推估上的誤差加大。在台灣，由於社會流動，戶籍所記載的愈來愈和實際的狀況脫節。在大陸也是一樣。很多在農村有戶籍的人口已經遷移到城鎮工作。在香港，市民時常買樓賣樓，住址時常改變。很多住在居屋和公屋的市民，其家庭亦擁有私人樓宇。這樣亦影響到香港政府統計處依據住宅進行抽樣的準確性。

(b)問卷問題。在台灣的社会變遷基本調查，瞿海源指出部份題目並不理想，有些意義不明或意義相當複雜，有些則效度不高，也有些題目可能在社會科學意義上不夠充實，甚至在形式上可能有社會讚許性或習慣性反應趨向。在香港，陳膺強指出不清楚的問卷會產生「無回應率」偏高的現象。很多時候受訪者對研究課題不感興趣或不明白為何被問及許多繁瑣又不知有何作用的問題，以及問卷過於冗長等

等，都是導致回應率低的原因。在大陸，很多工人和農民都沒有受訪問的經驗。如果問卷內容太複雜，他們傾向選擇「不知道」為答案。

(c)訪員素質問題。受僱的調查訪員，多半還是大學生。於是除了少數很有工作經驗外，每次調查時的訪員多是新手，必須加以訓練，這對調查研究十分不利。在台灣和香港，問卷訪問調查費偏低，很難建立專業專職訪問員的制度。在大陸，訪問員的素質比港台還低。很多訪問員僅是高中學生，便被派到他們的故鄉做調查研究。外國學者對大陸的訪問員都很有戒心。擔心他們在旅館裏閉門造車，並未實際到農村或工廠作過訪問。又擔心訪問員過於熱心，往往將自己的意見強加於受訪者的答案上(Nathan, 2000)。

(d)調查的「無回應」問題。香港政府的抽樣調查，一般都有相當高的回應率。但學術性的調查，回應率便相形見绌了。陳膺強指出香港的學術調查歷來都難取得超過30%的回應率。即使是電話調查，回應率乃僅得50%左右。香港都市生活節奏緊張，作息時間變化多端，更增加接觸受訪者的困難。再者，近年林林總總的訪問，更令部份市民感到滋擾。在台灣，洪永泰發現訪問失敗每有特殊傾向，所以樣本的代表性會因而受扭曲。在大陸，回應率通常頗高。但是在市區內的調查訪問，是一定要有居委會的支持才能成功。農村的訪問，必須得到農村幹部的批准，才可順利訪問農戶(Tang, 2000；Li, 2000)。

(e)靜態研究問題。調查是一種靜態的研究。有如照像一樣，調查研究假設我們可以「凍結」某一時間，調查員在這一「凍結」時間內盡量搜集資料，來描繪這段「凍結」時間的社會結構和解釋此社會上的行為。但孫立平提出一個新的研究方法，他主張用「過程—事件分析」的方法來進行研究，因為這樣才可跳出靜態結構分析的局限性。孫立平強調一種動態敘事的描述風格，將社會事實看作是動態

的、流動的，而不是靜態的。「過程—事件分析」所追求的則是一種對事物過程的連貫與流暢的描述與解釋。其實，動態和靜態研究並無抵觸。做調查研究並非不做動態「過程—事件分析」。反之，這兩種研究可以相輔相成，互補不足。

總括來說，抽樣過程，問卷內容，訪員素質，調查無回應和靜態研究都是很普遍存在的調查研究問題，在西方社會和華人社會都是常見的現象。下面討論華人社會獨有的調查研究問題。

(二)華人社會的調查研究問題

(a) 語言問題。儘管大陸，台灣和香港有不同的歷史發展，但他們都是華人社會，具有相當高程度的共通語言和文化，與西方社會的語言和文化迥異。所以當社會學者用西方的社會學理論和概念去研究華人社會，尤其採用調查研究方法去收集資料時，必須特別小心。很多西方的概念並不那麼容易翻譯為中文。翻譯出來的中文問卷往往與英文原稿大有出入。Montgomery Broaded (2000) 曾舉了一個教育問卷的例子。他擬在中國研究 self concept / self esteem 與教育成績的關係，但是如何正確翻譯 self 和 self esteem 呢？如何把中文譯出來字句放進問卷內？如何知道受訪者真的瞭解西方的 self 和 self esteem 概念呢？最主要的障礙是西方的 self 和華人社會的「自我」概念很不相同。受訪者當然很容易選擇某一答案或選擇不知道。但社會學者怎樣知道該答案是符合概念的指標呢？

(b) 心理二重區域。李強指出問卷方法是西方人所發明的。這種通過記錄答案來反映社會狀況的方法，基本上是以意願的直來直往的表達為前題的。例如，問一個人對某事件同意或不同意，該人就選擇「同意」或「不同意」，他的回答結果就被直接用來作分析。但是，華人社會則不同。因為中國人有李強所指出的「心理二重區域」。人

們的心理存在兩個區域，一個是可以對外公開的區域，另一個是不對外公開的、保守秘密的區域。西方人是直來直去的性格，往往第一個區域較大，第二個區域較小。而中國人的心理二重區域現象顯得更為突出，兩個心理區域常常有重大差異，有時甚至處於完全對立的狀態，譬如有意識地說假話。有時候心裏明明是「不同意」嘴上卻說「同意」。這是曲折表達個人意願的方式，亦稱為「拐彎抹角」的性格。因為被調查者所說的真假難辨，有些是假話，有些是實話。如此使情況變得極為複雜。李強提議在華人社會進行調查研究，一定要符合中國人的心理和風俗習慣。在問卷調查中，應該將場景、環境因素記錄下來。在資料分析時，要考慮說假話的因素。

(c) **資料比較性問題**。如果華人社會有別於西方社會，在華人社會搜集到的調查資料是否可以與西方社會的資料直接比較呢？例如，比較各國政府支持率，美國政府支持率是70%，在中國大陸是80%，我們是否可以說中國大陸的政府支持率比美國政府支持率高呢？如果我們相信李強的「心理二重區域」分析，則對這樣的結論持保留態度。其實不單是政治的取向，其他的變數諸如收入、教育和職業，也應該很小心的運用比較資料。農民、個體戶和國有企業的職工調查就很難由中得到一個客觀準確的數字測量收入。

(三)大陸社會的調查研究問題

(a) **政治敏感問題**。在所有華人社會中，大陸社會有異於港台社會。因此大陸進行調查研究，不同於在港台社會進行調查研究。大陸的政治環境對調查研究多有限制。如果得不到政府機關的批准和支持，學術性的調查研究就不易展開。在城市裏，由於治安的原因，生疏的調查員已經很難入戶進行調查。調查員必須依賴居委會幹部的協

助才能入戶調查。但又因為有居委會幹部在場，被訪者常常使用「標準」的政治術語和公開會議的話語回答問卷。所以在分析這些答案時是要特別小心。如屬政治敏感性高的問題，受訪者傾向避而不答，或者選擇「不知道」，或者用公開會議的話語回答這類問題。在農村進行調查研究，很難避免農村幹部的干擾。對有些農村幹部，任何問卷內容都視為政治敏感問題。如家戶的大小會被認為能反映出當地推行計劃生育的成敗指標，家戶的收入則可能顯示出他們誇大農村的經濟發展(Li, 2000)。因為上述的問題，大陸政府曾明令禁止有關部門和外國團體合作進行調查研究。美國學者曾於二〇〇〇年六月於華盛頓舉辦了一個「在中國進行調查」的會議，商討如何在中國敏感的政治環境下進行學術性調查研究。

(b) **調查理論的不足。**劉少杰指出雖然大陸調查的數量多，但是水平較高的調查報告並不多見，原因在於社會學調查的理論前提研究不足。在文革時期，強烈的政治氣氛和極左的政治控制，嚴重地扭曲了社會調查的理論指導。教條化的理論阻礙了調查者對社會現實的認識。改革開放後，因為這個歷史的包袱，大陸社會學者都迴避或淡化理論指導，忽視了西方的社會學理論。淡化理論的結果便把社會調查變成了直觀社會現象的「統計學」和「描繪學」。劉少杰指出在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八年期間「社會學研究」發表的調查報告，只有29%有明確理論前提，其餘都無理論前提或僅有隱含的理論前提。劉少杰建議調查一定要從大陸社會本質特徵和實際狀況出發，在理論和實踐結合中，開展有理論前提的社會學調查研究。

(c) **大陸社會的複雜性。**香港只是一個城市，台灣也是一個不太大的地區。而大陸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民族種類繁雜，每個省都有其地方特色，城市和鄉村區別很大。而近二十多年，社會、經濟、政

治和人口，變遷巨大、快速。不同的地區又有不同的發展經驗和模式。在這種環境下，應該如何進行調查研究？如果在一個城市和一個農村進行調查研究，其結論是否可通用到整個大陸呢？其實，由於大陸社會的複雜性，另一個重要的研究項目是探討大陸社會內部的差異性，例如大小城市、城鄉、南北、沿海和內陸、漢族和少數民族等等的差異。

本書除了討論上述的調查方法，還報告了最近在華人社會的調查研究成果。

最近華人社會調查研究成果

蕭新煌的調查報告探討台灣民眾環境意識的轉變。根據環境社會學者 Catton 及 Dunlap 的觀點，社會學界對自然環境所持態度可分為「人類特殊典範」(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簡稱 HEP)和「新環境典範」(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簡稱 NEP)兩種。前者認為人為的經濟活動與成長將永無止盡，後者則強調人類應與自然環境和諧共處，經濟開發也應該受到限制。蕭新煌根據一九八六和一九九九年兩次的「台灣環境意識與價值調查」結果，企圖探討：「經過了十三年，台灣社會取向到底是更傾向 NEP，還是仍執意 HEP？以及其分佈的趨勢是如何？有何改變？」研究顯示，台灣民眾無論在環境知識和環境意識上，都較以前提升很多，更傾向於 NEP。但台灣的「年輕新中產階級」對環境問題雖高度敏感，對科技卻依然崇拜，對核電危險也持過於樂觀的態度；這點與西方社會所提出的「新中產階級是新環境典範最主要持有者」的論述不盡相同。

熊瑞梅的調查報告研究側重性別、個人網絡與社會資本的關係。熊採用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檢定性別對個人情感性和工具性

網絡結構特質的獨立影響力；網絡結構特質變項包括三個面向的變數：網絡規模和網絡關係組成、網絡結構異質性、和網絡社會與地理親近性。一旦控制了年齡、教育程度、就業機會、婚姻家庭結構變項後，台灣個人網絡資料的性別化現象，較美國一九八五年個人網絡資料效果更顯著。這樣的研究發現意謂着，台灣女性偏好親屬網絡資源和強連繫的網絡成員；此外，在美國資料中，已婚有助於網絡規模的增大，但台灣資料，不論男女，已婚網絡規模都減少；女性的網絡規模變化最大，她們結婚後增加親屬成員，大量減少同學朋友等非親屬關係。台灣女性強調親屬強連繫的個人支持網絡，可增進生活的快樂程度，但減少個人的所得報酬；換言之，女性個人網絡的效果較有利於促進社會整合，而不利於個人工具性的資本累積。台灣個人網絡資料包括了情感性和工具性網絡的測量，有關於網絡測量與網絡社會資本的涵義仍然是一個相當爭議但值得繼續探討的主題。

李強的調查報告研究市場轉型與中間階層的代際更替。二十年來，中國大陸經歷了從中央集權配置資源的計劃經濟型社會轉向市場配置資源的市場型社會的巨大轉變，學者們一般稱之為「市場轉型」。李強從宏觀結構角度，對於市場轉型影響下的兩代中國人進行研究。他提出的基本假設是：市場轉型是以一代中老年國企職工地位下降為代價的。在過去計劃經濟下，作為當時社會中間階層的國營企業職工，目前這一代中老年人，在市場經濟下出現了整體的衰落。而作為新崛起的一代年輕人，特別是在一些反映未來發展趨勢的新興產業和大城市中，正在形成新的中間階層。換言之，大陸中間階層出現了年輕化的趨勢，儘管這個中間階層還比較弱小。

譚若梅的調查報告研究中國男女的性別態度及其與就業投入感的關係。她採用《一九九〇年當代中國婦女地位抽樣調查》來分析廣